责编：沈辉 E-mail:zydxshenhui@2008.sina.com Tel:010—62806418

◆观 点

缩小贫富差距须进行八项改革

针对我国财富与收入分配差距所进行的大量研究，尽管得出的具体数据不尽相同，但大多认为近20年来呈现出迅速扩大的趋势，在程度上大多认为已经处于非常严重的阶段。如何缩小财富与收入分配差距，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八个方面的改革入手。

一是创造条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促进第一产业部门的劳动力在市场力量的支配下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是在市场没有失灵的竞争性经济领域，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推进行政垄断行业的改革，推进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国有企业改革，实行主动退出战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应尽快解除竞争性经济领域广泛存在的行政性进入壁垒，对各种经济力量特别是民营经济部门开放经济机会，打破行政垄断，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因行政垄断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如电力、石油石化、烟草、电信、金融、保险等经济领域就存在严重的行政垄断。

三是解除对经济活动的行政管制，加强对经济活动监督管理，减少经济管理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致力于从根本上消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以消除灰色、黑色收入带来的财富与收入差距。同时，通过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优化商业环境，提高经济活动的自由度，可以释放出更大的经济活力，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增加家庭部门的工资性收入。

四是改革税收制度。降低宏观税负水平，扩大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扩大家庭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优化税收结构，扩大直接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加强对高收入群体和高资产净值群体的税收调节力度。间接税具有累退性质，以间接税为主的税收结构提高了中低收入阶层的税负水平，扩大了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差距。认真研究开征遗产税的真实后果，审慎推进不动产税的征收，提高财产税在税收收入中的比重，加强对财富存量的税收调节，缩小财富差距，缩小不同收入阶层在财产性收入方面的差距。

五是在党的领导下，有序、积极、主动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制度上加强社会对权力的监督，减小官员的寻租活动与贪污腐败行为，取缔非法收入。

六是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一切改革都要以效率为核心。保证了效率，就是最大的公平，损害了市场的公平竞争、平等竞争、充分竞争，就是最大的不公平。只有通过建立充分竞争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够真正保障劳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各种生产要素按照其在财富创造中贡献的大小参与收入分配，才能真正提高工资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中国绝大多数家庭掌握的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就是劳动，工资性收入是绝大多数家庭部门收入与财产积累的主要来源。如果在初次分配领域不能保证效率原则，试图主要通过再分配来调节初次分配的不合理结果，既是治标不治本的扬汤止沸之举，也是再分配所不能承受之重。

七是通过制度创新，多渠道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规范资本市场，严惩内幕交易、财务造假等违法行为，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业余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让利率真正反映金融资源的市场稀缺程度和供求状况，尽早终结负利率，终结存款人特别是中小储户对国有企业的隐性补贴，保护存款人的经济利益。加快土地制度改革，让农民能够更多地分享土地增值的好处。

八是不断扩大社会保障系统的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特别是要与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综合国力的提高以及通货膨胀水平相适应，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这对于平抑初次分配的差距具有重要意义。（2013年12月30日《中国青年报》卫志民）

“官不好当”是一种进步

在“既要打老虎也要拍苍蝇”的反腐语境下，曾经让百姓无比艳羡的“官员群体”，这一年过得越来越不自在了。“八项规定”出台以来，大到停建楼堂馆所，小到严禁公款贺卡，约束官员的规定越来越细，中纪委“亮剑”成果显著。

在自媒体时代，官员的整个仕途装满了“摄像头”。官员戴块名表、抽盒好烟、喝顿洋酒、说句妄语、上KTV潇洒一回，都有可能瞬间变成公共事件，轻则丢乌纱帽，重则锒铛入狱。如今，官员的购物卡没了，私人会所去得少了，更不能大操大办了。《行政诉讼法》大修后，“民告官”的困境也有望破解了。正如有人感叹，现在官不好当了、当官没意思了。

更重要的是，行政审批的削减下放和行政改革的深入，改变了政府运作模式和官员的行为方式，地方政府支配重要资源的能力和干预微观经济的权力逐渐缩小，寻租空间相应减少。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种突破性表述是政府的觉醒，而管住“看得见的手”也是政府和市场各自功能归位的新导向，更是对当前社会强烈期盼的回应。

“官不好当了”是一种进步。随着权力一步步被关进笼子，还会有更多官员觉得不自在，随心所欲地行使特权的“好时光”即将过去。我们可以期待，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完善，当决定着资源分配的不是官员个人的偏好而是法律和规范之时，当企业的发展壮大不是靠官员的“金笔一挥”而是企业家能力之时，政府与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终将厘清。（2014年1月8日《光明日报》子房先生）

◆文 坛

邵逸夫改写的不仅是电影

2014年1月7日，香港TVB荣誉主席邵逸夫先生驾鹤西去，享年107岁。虽是如此高寿仙逝，却依然引来一片叹息。邵逸夫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太大了，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个香港知名电影制作人和娱乐业大亨，更是一个卓越的慈善家，全国许多大中小学校里，都矗立着以他名字命名的“逸夫楼”；而有东方诺贝尔奖之称的“邵逸夫奖”，更是在表彰人类科技拔尖人物、促进科学研究方面居功至伟。就笔者而言，求学时泡在逸夫图书馆里，就业后又频频出入逸夫舞台。像我一样，受其泽被者可谓无可胜数。

邵逸夫的电影传奇，常常成为人们的谈资。从最初的天一电影公司，到上世纪30年代新加坡成立的邵氏电影公司，再到上世纪50年代的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他渐渐建立起一个电影王国。当年的香港电影是贫乏的代名词，而自从1932年邵逸夫捣鼓出一部《白金龙》后，才让香港被关注起来。随着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成立并推出一大批港产影片，香港影界一跃成为“东方好莱坞”。从一个在洋学堂念私塾的小孩成长为影坛大亨，他的人生经历，让我们窥视到个人成长与民族企业成长之间的正相关联系。他的事必躬亲，他的精力旺盛，也让每个人感受到理想和细节的和谐共振。

也许人性比较偏恋八卦，对邵逸夫先生的解读，还有很多的是他的童言无忌、生活趣闻。我们无数次看到他西装笔挺地行走在红地毯上，香槟美酒与美女围绕左右。在笔者看来，这既是他娱乐业的“名片身份”使然，也是他潇洒人生态度的尽情展示。他的“永远年轻”的生活方式，绝不是简单的物质主义的炫耀，而是具有精神层面的启示意义。对一份事业凝聚高度的热情，永不停歇地站在业界的巅峰，才能让他的电影王国一直制造传奇、新意迭出。

我们常常喜欢用“他虽然是个商人”的句式，好像商人天生具有某种缺陷。但论一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商人捐献的真金白银往往具有货真价实的意义。他的确是个商人，他的巨大企业航船离不开利润的支撑，但这不正是社会规律的一部分吗？要紧的是看他的财富是否取之有道，乃至“散之有道”。当邵逸夫先生用超过100亿港元用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时，这样的慈善为怀，也足以令人肃然起敬。

就对文化领域的影响来说，邵逸夫不仅改写了香港电影，他还改写了香港电影以外的很多东西。他的个人形象，以及他一手打造的“四大天王”形象，已经走进了无数人的集体记忆中。不管怎么说，他的仙逝，是香港乃至中国文化产业的巨大损失。此刻，我们对他表达一份怀念和敬意，也可以借此在邵氏作品中，寻找我们曾经有过的心灵慰藉。（2014年1月8日求是理论网刘巽达）

◆史海钩沉

钱三强为何不能亲见原子弹上天

2013年10月16日是我国著名原子核物理学家钱三强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作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钱三强不仅在20世纪50年代领导建成我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还亲自带领攻坚团队成功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发现者、“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中国原子弹之父”、“中国的居里夫妇”、“科技界的三钱”、“交叉学科倡导者”……种种头衔，无不昭示着钱三强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巨大贡献。

1956年11月16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成立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钱三强与刘杰、袁成隆、刘伟、雷荣天等被任命为副部长。他是副部长之中唯一的科学家。聂帅曾经对钱三强说过：“搞原子能，你是行家，就请你提建议，我们大家商讨决定。”

钱三强身为二机部副部长兼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和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承担着各相关技术协作项目的具体组织领导工作，其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还承担着铀-235的分离，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探测技术安全防护等方面的责任。他知道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说：“作为一个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此时此刻心里很清楚这对于中国的原子核科学事业，以至于中国历史，将意味着什么。前面有道道难关，而只要有一道攻克不下，千军万马都会搁浅。”

1959年6月，苏联撤走专家后，聂荣臻副总理对钱三强说：“我们要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攻克原子弹、氢弹方面的尖端科学技术问题，我们一定要争取在国庆15周年前后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至于人员选定，由你负责点将，点到哪个单位，哪个单位都不能打折扣。”

尽管压力巨大，但这是钱三强最繁忙、也是心情最舒畅的日子。他说：“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时代。”

1960年，他推荐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王淦昌和彭桓武，力学研究所副所长郭永怀，到核武器研究所任副所长，他们一起领导了核武器攻关小组。经过4年努力攻关，研制成功扩散分离膜、六氟化铀、点火中子源等。其中的扩散分离膜是铀-235生产中最关键、最机密的部分，被苏联人称为“社会主义安全的心脏”，从不让中国的科学家靠近。

这些成绩的取得，无不和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所有关。下面的数字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据统计，从1959—1965年7月，从原子能研究所调出的科技人员共计914人，其中正副研究员、正副总工程师28人，助理研究员、工程师147人，研究实习员、技术员712人。同时，还为兄弟单位培训了1706名科技干部。这些人员多数都成为我国“两弹”攻关和核科研中的中坚力量。1962年11月，中央专委成立后，为加快原子弹的研制，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继续搞原子弹技术，一路直接奔赴一线搞核试验。为此，张爱萍请钱三强推荐一位核试验的领军人物。钱三强推荐了原子能所的副所长程开甲。因此，曾有人说，原子能所是“两弹”研制的“老母鸡”。还有人说，在中国研制“两弹”的豪迈进军中，原子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巨响，震惊了世界。

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仅仅3天，钱三强就被派往河南农村参加“四清”运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而这又要追溯到1957年的“反右”。

1956年，钱三强带领40多名科学工作者在苏联实习考察。刚从美国回国的钱学森，也来到苏联和钱三强一同考察。

1957年，帮助全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开始。

这时，有人奉命来找钱三强、钱学森，征求他们对党内整风的意见。

钱三强谈到当时的情景说：“学森刚从美国回国不久，对情况不够了解，就不谈什么意见吧。”实际上，是钱三强为钱学森挡驾了。

钱三强则毫无顾虑地向来人谈出了心里话。他说，法国的科学家，每年有固定的经费、研究项目，由科学家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自己来制订计划，政府在一般情况下不过问，科学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苏联从彼得大帝时期，就吸收法国的经验；在斯大林时期，党组织在科学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后勤工作，一切由科学家自己来管理和领导。据此，钱三强建议：“中国应该吸收法国、苏联这方面的经验，改进体制，充分信任知识分子，让他们有职有权，业务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学家自己来负责，党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协助科学家搞好工作。”他还具体说明：“如果体制上不好马上动，可以先选拔几位有才干的科学家到领导岗位上来，参加领导工作，这会很有力地推动科学事业的发展。”

可他的善意之议，却被一些人认为是要取消党的领导，是反党言论，要把钱三强划为右派。后来，还是因为毛泽东、周恩来和聂荣臻的保护，钱三强才侥幸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1962年1月11日—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检讨，并说自己要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等负责第一线的领导工作。

在这一年召开的广州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兴高采烈地宣布“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陈毅元帅还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行鞠躬礼。

◆声 音

保持高压态势坚决惩治腐败

2013年中央的反腐败力度比以往更大了！李崇禧、李东生、陈安众、童名谦、陈柏槐、郭有明、许杰、戴春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多名高级领导干部相继落马，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2013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用实际行动彰显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定决心，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

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了一系列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王岐山同志担任中央纪委书记伊始，就明确指出，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据统计，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接受信访举报195.0万件（次），总量比上年增长49.2%；初步核实处置反映问题线索19.7万件，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2万人。

通过查办案件，惩处了腐败分子，严肃了党的纪律，教育了党员干部；同时，也为不少干部澄清了问题，保护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

“老虎”“苍蝇”一起打

在查办案件工作中，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党政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坚决查处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进一步增强全党全社会反腐败信心。

严肃查办县处级以上干部违纪违法案件。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分县处级以上干部6400余人，比上年同期增长36.3%。中央纪委监察部严肃查办了周镇宏、刘铁男、倪发科、王素毅、李达球、杨琨、齐平景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并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目前正在立案调查的还有蒋洁敏、李东生、李春城、郭永祥、季建业、廖少华、陈柏槐、郭有明、陈安众、童名谦、王永春、许杰、戴春宁、杨刚、李崇禧等案件。各地区各部门也查处了一批在本地区本部门有影响的大案要案。比如，安徽省纪委查办了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陈良纲严重违纪违法案件，广东省纪委查办了深圳市原副市长梁道行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严肃查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把监督执行“八项规定”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严格执行有关纪律处分规定，加大责任追究力度，以严明的纪律督促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进作风。截至2013年12月31日，各省（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24521起，处理30420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692人。中央纪委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案件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的要求，体现了改进作风“言必信、行必果”的决心。各地也通报了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典型问题，严肃处理了相关人员，起到了严明纪律、端正风气、警示教育的作用。

严肃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违纪违法案件。2013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发生在农村的案件8.3万件，处分8.7万人。坚持把人民群众关注点作为查办案件工作的着力点，查办发生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土资源、教育等部门的案件。同时，还查处了一批职级不高、涉案金额巨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小官巨贪”案件。

严肃查办重大责任事故背后的违纪违法案件。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积极参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工作，深挖细查事故背后的违纪违法问题，督促责任追究落到实处，最大限度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比如，监察部会同有关部门，对吉林省长春市宝源丰禽业有限公司“6·3”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吉煤集团通化矿业公司八宝煤业公司“3·29”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认定这两起事故都是特别重大责任事故，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对涉嫌犯罪的35名责任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对其他73名责任人分别给予纪律处分。

腐败没有“特区”，反腐败没有“禁区”

2013年1—11月，四川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8978件，其中厅级干部17人、县处级干部215人，立案数同比上升29.7%。1—11月全省县级纪检监察机关立案4158件，同比增长18.3%；乡镇纪检组织立案4210件，同比增长39.7%，解决了一大批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一件件大案，一组组数字，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老虎”“苍蝇”一起打，体现了中央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的态度，表明了腐败没有“特区”、反腐败没有“禁区”。

反腐败征程任重道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将按照中央的部署，继续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要突出办案重点，严肃查办发生在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贪污贿赂、买官卖官、权钱交易、腐化堕落、失职渎职案件，严肃查办发生在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群众身边的腐败案件。要创新查办案件工作模式，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要建立健全腐败案件揭露、查处机制，建立健全查办案件组织协调机制，做到有群众举报的要及时处理，有具体线索的要认真核实，违反党纪国法的要严肃查处。要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反映党员干部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谈话提醒、诫勉、函询、教育，防止小错酿成大错，防止“苍蝇”演变成“老虎”。（2014年1月10日《人民日报》姜洁）

钱三强在回科学院传达会议精神时，心情激动。他联系实际，讲了如下一段话：“聂荣臻元帅说，他要当科学家的后勤部长。我们有些支部书记不是这样。他们不积极帮助科学家解决困难，只知道看档案、抓批判、搞运动，实际上是起了阻碍作用。”

钱三强此言一出，当即引起了很大震动。有人还翻出“反右”的旧账，认为钱三强比当年更加露骨地反党，并叫嚷，这种人早就不应该再留在二机部领导岗位上了。此外还认为钱三强在国外留过学，有不同寻常的海外关系。他在二机部这样的要害部门担任领导，不利于保密。

因此，二机部决定把钱三强调离，不再参加原子科学的攻关。为了弄清问题，周恩来亲自到二机部听了一天情况汇报。因为有推不脱的外事活动，他又派聂荣臻副总理继续听取汇报。二机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刘伟说：“调走三强同志这个报告是谁搞的，我为什么不知道，这种行动符合党的原则吗？对一位对党忠诚的同志，能够这样随便怀疑吗？”

摸清情况以后，聂帅代表周总理宣布：“你们连钱三强也不相信，你们还能相信谁？”在周恩来的干预下，调出钱三强的计划没能实现。

调出不行，但思想教育可不能少。就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当晚7时，钱三强还遭到批判。3天后，即10月19日，他就被送往了河南信阳。这样，开庆功会时，就没有了核物理学家、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身影。

对此，钱三强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1964年，原子弹上天。上午××通知我，听听广播。5点到7点开会，对我提意见，把我送下乡搞‘四清’运动。后来他们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们几个搞的。”

“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党的时候，总支书记（一位长征干部）说的一段话：‘三强，你可能认为，入了党就一片光明。实际生活是复杂的。将来你会知道，党内也还有尖锐的斗争呢。’当时，我还不理解。十年后，我才理解了这句话的意义。”（2013年第20期《国家人文历史》李崇寒）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100号 邮政编码：100091 社长兼总编辑：谢春涛 常务副总编辑：钟国兴 广告部电话：62805980 62806380 发行部电话：62806227 兼传真 总编室电话：62805368 62806234 电子信箱：xuexishibao@126.com
定价：全年180元 邮发代号：1—267 国外发行代号：W3970 开户银行：建行北京中关村分行 户名：中共中央党校报刊社 账号：2613000456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0301号 承印：人民日报社印刷厂